

5-1-2016

政商夾縫中的右傾文人：五、六〇年代黃思騁文學活動研究 = A
right-wing writer trapped in politics and business : a study of
Huang Sicheng's literary activitie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Yuen Mei, Fanny LI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in.edu.hk/jmlc>

Recommended Citation

李婉薇 (2016)。政商夾縫中的右傾文人：五、六〇年代黃思騁文學活動研究 = A right-wing writer trapped in politics and business: A study of Huang Sicheng's literary activities in the 1950s and 1960s。《現代中文文學學報》，13(1-2)，68-93。

This Special Issu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現代中文文學學報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政商夾縫中的右傾文人：五、六〇年代黃思聘文學活動研究

**A Right-wing Writer Trapped in Politics and Business:
A Study of Huang Sicheng's Literary Activitie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李婉薇 LI Yuen-mei, Fanny

香港教育學院文學與文化學系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 引言

一九五九年二月，新加坡和英國簽署自治協定書約兩年，¹ 南洋大學商學院銀行系及工管系的四十多位同學出訪港台，考察兩地的經濟狀況和金融機構。他們抵港後，由《大學生活》和《中國學生周報》舉行招待茶會，並由新亞書院南洋同學會十多位同學作陪，之後他們參觀了香港紗廠、九龍總商會、香港大學和友聯出版社。他們訪台後，又再經港訪問其他大專院校和工商團體。《大學生活》報道是次活動時，在最末一段熱情洋溢地說：「星馬、香港與台灣，是東南亞的三大工商業中心，同時也是目前海外保存發揚中國固有文化的三大堡壘。此三地的人士之互相訪問和觀光，不只會促進此三地的工商業之發展和合作，同時就保存和發揚中國固有文化來說，也可以收融匯貫通之效。而南大這商學院兩學系之旅行團，便是使這三地貫通起來的一支先鋒隊。我們敬祝他們此行順利成功！」² 這次活動充份表現五〇年代中後期在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資金的支持下，港台星馬建立的「文化聯盟」關係。³ 這種聯盟關係見諸多種社會層面，包括文學創作和出版。事實上，冷戰時期港台星馬的文學互動，近年漸受學術界重視，研究成果日趨豐富，⁴ 而已有

-
- 1 羅佩恆、羅佩青合編：《新加坡簡史：創業的背景・獨立的道路》（新加坡：新教育出版社，1984），頁 123。
 - 2 〈歡迎南洋大學同學旅行團〉，《大學生活》第 4 卷第 12 期（1959 年 3 月）：封底。
 - 3 「文化聯盟」一詞為筆者配合本文的議題而發明的詞彙，用以指稱五六〇年代港台星馬在文藝、電影、教育、出版等方面形成彼此支援、互相影響的關係。
 - 4 可參考下列學者的研究：簡義明：〈冷戰時期台港文藝思潮的形構與傳播——以郭松棻《談談台灣的文學》為線索〉，《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8 期（2014 年 4 月）：頁 207-240；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國文學報》第 52 期（2012 年 12 月）：頁 69-100；金進：〈1950、60 年代香港與馬華現代文學關係之考辨——以姚拓的文學活動為中心的考察〉，《香港文學》第 333 期（2012 年 9 月）：頁 46-53 等文。研究生論文則可參考王梅香：《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〇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國立成功大學，2005）、詹閔旭：〈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臺灣—馬華文學〉，《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8 期（2013 年 5 月）：頁 45-74 等。論文集可參考陳建忠主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等。

論者指出當時的香港和星馬實為一「文學共同體」。⁵

一九四、五〇年代之交，在香港的大陸作家紛紛返回內地，南下的右傾文人適時地填補了文壇的空白。⁶ 在他們之中，黃思騁（1919-1984）是比較少被提到的一位。但他在冷戰前期的各種文學活動，⁷ 都能反映這個以香港為據點、活躍於大陸周邊的「文化聯盟」，使他得到廣闊而相對自由的舞台，實現他的文學理想。與此同時，不應忽略的是，商業活動對身處香港的作家也許有更本質性的影響。⁸ 當時香港的通俗文學發展蓬勃，影響遍及星馬。作為嚴肅作家的黃思騁，他在五〇年代末至六〇年代初寫過少量「三毫子小說」，⁹ 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嚴肅小說家和商業城市的張力。他的「三毫子小說」中的反通俗元素，表現了黃思騁的主體性如何改換了通俗文類的成規。倘能綜合上述政治和商業的兩條線索，可更全面地考察黃思騁作為身負政治信念、文化關懷和文學理想的右傾文人，如何與他身處的時代配合和抗衡，為香港以至星馬的文學事業帶來怎樣的貢獻。儘管作為小說家，黃思騁在文學史的座次不如經歷和他略有相似的劉以鬯，也不如領導出版社和文學雜誌、作

5 見莊華興教授在 2014 年 5 月 28 日香港中文大學「今古齊觀——文學的傳統與現代」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題為：「香港—馬華文學共同體的形成」。

6 黃思騁在移居香港初期曾經寫作反共小說，或可以此將他定義為「右派文人」。但筆者在本文使用「右傾文人」一詞，主要考慮黃氏一生更多從事文學創作、翻譯、編輯和出版工作；同時，本文旨在把握政治空間下的非政治性，意圖再現當時文學活動複雜的現象和性質，「右傾文人」更為有助表達這兩方面的意思。

7 在本文中，「文學活動」一詞兼指個人的和集體的兩種，前者主要指黃思騁的「三毫子小說」創作，後者主要指他和其他右傾文人的文藝工作，包括多種文學雜誌的編輯和相關的活動、「香港中國筆會」的聚會和外訪等等。

8 黃繼持指「在香港固然有各種政治活動，但多是外頭引入的，未必代表香港社會的本質。香港畢竟主要是商業社會。香港的出版業，往往帶有濃厚的商業氣息。劉以鬯曾說香港文學是在政治與商業的夾縫中求生存。」鄭樹森、黃繼持和盧瑋鑾編：《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頁 24。

9 許定銘指「『三毫子小說』指的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售價僅『三角』的流行小說，這種小書是十六開本，連封面及封底僅二十頁，內文可刊四萬字的中篇，還有若干幅插圖，甚至以雙色印刷吸引讀者。封底一般作廣告頁，封面則請名家繪畫構圖細緻、色彩鮮艷，與內容相關的插畫，擺放在報攤紅黑報頭的日報叢中相當醒目，內容多為奇情及驚險小說……」（〈三毫子小說〉，《大公報》，2011 年 4 月 9 日，C04 版。

品風行香港和星馬的好友徐速，但終生投入短篇小說藝術探索的黃思騁，在政治化和商業化的語境中尋覓文學理想植根和傳播的可能，未嘗沒有代表性的意義。

本文首先介紹黃思騁的生平，上半部以「香港中國筆會」及《當代文藝》等刊物為主，探討黃氏在其中的活動及角色，分析它們和「美援文化」的關係，管窺這些文學刊物和組織，如何使右傾文人在政治化的夾縫中得到開拓視野、實踐文學理想、推動文學發展的機會。下半部以女性形象為切入點，分析黃思騁「三毫子小說」的文本特點，以見嚴肅作家和通俗小說互為他者的現象，考察商業化的文學工業中作家主體的影響力。最後總結在五、六〇年代的香港，黃思騁作為右傾文人和嚴肅小說家，其生存狀態有何特點，並帶來怎樣的結果。

2. 生平略述

黃思騁，浙江諸暨人，一九一九年生，一九五〇年自上海來港，之後一直從事寫作和編輯工作，一九八一年起先後罹患直腸癌和肝癌，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一日病逝。黃氏抵港初期，先後在仁人出版社、亞洲出版社及自由出版社當編輯，一九五二年主編《人人文學》，但該刊約於翌年年中起，已改為由力匡、夏侯無忌主編，¹⁰ 惟黃思騁的小說仍在該刊發表。一九五五年「香港中國筆會」成立，黃氏是主要成員，幾乎每期都在筆會編印的《文學世界》發表短篇小說，其後也在《大學生活》介紹外國文學和發表短篇小說。在一九五九至六〇年代初，他到馬來西亞編輯《蕉風》，同時也在這刊物發表小說，其後又從事教學工作。同時，黃思騁也寫過一些「三毫子小說」，主要由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五年徐速創辦《當代文藝》，黃思騁持續在該刊發表小說。徐速創立的高原出版社在六、七〇年

10 力匡指「阿黃主編過一份文學月刊，但他的主編的位置很快被香港的一個嶄露頭角的詩人所取代了。我為此事，總覺得欠阿黃一份人情。」見〈關於阿黃——黃思騁〉，《香港文學》第22期（1986年10月）：頁23。

代也時常為黃思騁出版小說。此外，他的作品偶有在台灣報刊發表，從五〇年代中後期的《自由中國》到六〇年代末的《純文學》，再到七〇年代中的皇冠叢書，都讀得到他的作品，他也曾在《中國時報》發表文學評論。黃氏約於 1972 年到樹仁書院任教現代文學，教學生涯長達十一年，但同時寫作不輟。從上述資料可知，黃思騁的創作量十分驚人。據徐速和他自己在 1961 年所說，當時他的小說創作量已達九百萬字，¹¹ 因此薛金華說他的創作「以數字量夠驚人」，又稱「他在香港卅四年的生涯中，應可以說是以寫作為生。」¹²

和徐速的友誼，可以說是影響黃思騁一生的關係。黃南翔指出：「他們兩人是同時代的小說作家，也是好朋友，早在五〇年代初彼此一來到香港時就認識，且一起投身於文學事業。徐致力於長篇小說的創作，黃則潛心於短篇小說的經營，都卓然有成。」¹³ 徐、黃二人的文學戰友關係，歷近二十年不變，甚為難得。徐速談到這段友誼，溫暖而不無滄桑感：

我與黃思騁是十多年的老朋友，從國內一到香港，我們就認識了。在這十多年中，我們的生活，經過了許多波折，也看到了許多「太陽下面的」新事物。由於文化工作的艱苦，從前在一起的朋友，大都分道揚鑣了；現在，算來只有我和和思騁還堅守着寫作的崗位。

在這方面，我很欽敬思騁的毅力和才氣。¹⁴

11 徐速：〈黃思騁與「獵虎者」〉（代編者的話）及黃思騁：〈自序〉，《獵虎者》（香港：高原出版社，1961）。

12 薛金華：〈悼黃思騁〉，《星島晚報》，1984 年 5 月 16 日。薛金華在本文謂：「他寫了卅多年，以字數論夠驚人，是否有所謂不朽之作，此乃千古事，非我可論述，何況近十多年我沒有看過他的小說。好多年前我曾問過他最滿意自己的長篇是哪一篇，他曾毫不考慮的說是《跑馬溜溜的山上》。」黃思騁在《文學世界》、《大學生活》、《當代文藝》等文學雜誌發表的小說，題材和風格多樣，既有如徐速說「犀利諷刺」的，也有頗受契訶夫等名家影響，帶翻譯或新文藝腔的，常以探索人性為主題。由於本文主要以政治和商業兩條線索作研究的座標，又兼顧黃思騁作為文藝推動者的角色，他的這些作品未及細論。

13 黃南翔：〈黃思騁不羈而又執著〉，《香江文藝》總第 24 期（2003 年 12 月）：頁 49。

14 徐速：《獵虎者》，頁 2。

徐速在這篇充滿感情的文章中，替好朋友不值，認為黃思騁的努力沒有得到相應的報酬，香港社會對這個埋頭苦幹的人太不公平。他得知黃氏打算到南洋教書後，¹⁵不但「感覺心頭很沉重」，還甚為激動地說：「香港的市面是那樣的繁榮美麗，但卻要擠走了一個以腦汁餵養它的作家，而許多蠢豬、吸血鬼，以及成千成萬的都市蛆蟲卻在這裏逍遙自在。」¹⁶ 他還擔心黃思騁因為教務而放下小說創作，因此有人向他約稿，都會推給黃思騁。他坦言擔心朋友的作品太受西方名家影響而跳不出別人的影子，這是十分持平的見解，但他仍然十分欣賞黃思騁的小說，高度稱讚《獵虎者》「畢竟跳出了西洋名家的囿限，而自成一格。它表現的深度，技巧，已堪與西方第一流的短篇作品媲美。」¹⁷ 徐、黃二人的關係可以視為一個例子，顯示右傾文人志同道合的感情，使他們的出版社和雜誌雖然一開始有「美援文化」的支持，似乎有特定的政治目的，但在實際操作上，卻又有全人雜誌的非功利色彩。對黃思騁來說，小說創作一直沒能帶來可觀收入，但徐速的出版社和雜誌使他得到創作和出版的平台，並能發揮新文學推動者的角色。

黃思騁雖然沒有直接的政治論述，但政治立場十分明確。在香港渡過的下半生中，他接觸的文友和文學組織、發表作品的文學雜誌，絕大部分都屬右派，小部分屬政治中立。黃氏在五〇年代初寫過一些反共小說，如「人人文叢」第一部作品《春天再來的時候》，¹⁸ 收入四個短篇小說，首篇同名作品以韓戰為背景，寫被共產黨逼上戰場的農民如何逃出生天。比較特別的是「亞洲兒童叢書」的《香港遊記》，¹⁹ 這個政治化、散文化的兒童故事以阿東為第一人稱敘述者，他有一位住在新加坡的表哥，名叫一平，趁暑假來港遊玩，阿東一家作陪，遊覽香港名勝，書中附有香港

15 根據姚拓的回憶，黃思騁到南洋的主要「任務」還是在吉隆坡編輯《蕉風》，後來因為「工作准證不易取得」，才轉到麻坡當中學老師。詳見本文第三節相關論述。

16 徐速：《獵虎者》，頁3。

17 同上，頁6。

18 黃思騁：《春天再來的時候》（香港：人人出版社，1952）。

19 黃思村著、嚴以敬繪圖：《香港遊記》（香港：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6年6月）。

地圖和「亞洲兒童少年叢書贈品獎券」。阿東一行人參觀的地點除了太平山、虎豹別墅、淺水灣、長洲等香港著名景點，還包括調景嶺。敘述者在開首這樣說：「表哥在南洋的時候，已經聽說香港有個調景嶺了。許多為了反抗暴政，爭取自由，從大陸逃出來的人，都住在這個地方。很想去看一看。」媽媽這樣和應一平遊覽調景嶺的提議：「去看看也好，讓他把調景嶺的事蹟，帶給南洋的僑胞聽聽。」²⁰文中還平實地描寫調景嶺貧困的生活情景，記述有哪些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爸爸在途中不忘提醒孩子們說：「你們想想吧，他們從前都是有一個好好的家。如果在大陸上有自由，他們為什麼要逃到這裏來呢？」「這個小小的地方，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已經知道了。誰都知道調景嶺是一面爭自由的旗子。」離開的時候，阿東一家人走山路去鯉魚門，並提到「謝公路」的掌故，²¹篇末敘述者總結說：「我們聽了這些話之後，都很受感動。一平表哥還想寫一篇文章，來記念這件事呢。」²²表哥來自新加坡，並且希望他把調景嶺的事在南洋傳播，可說是隱喻了當時在美國支持下右傾力量在港星兩地形成的聯盟關係。

必須一提的是，黃思騁抵港初期寫作的政治宣傳作品立場露骨，但作為新文學推動者的作家，他像許多右傾文人一樣，有意和政治保持距離，這固然因為香港殖民政府對左右兩派都有一定的監控，但也因為他們對捍衛傳統文化和推動新文學有真誠的信念。²³他們身兼多種角色卻能清晰分工，使文學事業雖然因為政治資金得

20 均見《香港遊記》，頁 69。

21 傳說一位姓謝的善長為了解決調景嶺居民的交通問題，出資修築一條山路連接油塘，稱為「謝公路」。

22 分別見《香港遊記》，頁 70 及 71。

23 鄭樹森、黃繼持和盧瑋鑾三位學者在討論五六〇年代左右對壘下的文學和文化氛圍時，甚為強調政治籠罩下仍然存在一定的文學和思想空間，「美援文化」的結果不一定和美國政府的初衷相同。如盧瑋鑾指：「對於在冷戰氣候下出現的『美元文化』，有些人認為全是純反共動作，或政治宣傳，其實未免有點『想當然』。」黃繼持指：「『美元文化』聲勢浩大，又能夠打入當時的大專院校，如新亞、珠海等，但錢穆、唐君毅等學人有其本身立場，並沒有一面倒傾向美國文化，反而更着重中國人本位的感受和思考。」鄭樹森指：「從今天回顧，情況確實如此，所謂『左右對壘』，只不過是概括上的方便。當時的文藝青年閱讀書刊時，不會去區分左右，只作為文學作品來閱讀。」見《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頁 17-19。

到傳播的平台，卻在一定程度上能不受政治感染，五六〇年代右傾文人經營的文學雜誌因而得到廣泛的讀者，長遠來說，能切實地影響香港和星馬的文學發展。

3. 「美援文化」下的文學薪傳者

3.1. 香港中國筆會及《文學世界》等刊物

香港中國筆會是五、六〇年代黃思騁在港從事文學工作的重要平台，透過這個組織及其中的友儕關係，他作為新文學的推動者、香港文學的栽培者等身份才成為可能。黃思騁和中國筆會的關係，一開始就甚為深厚。香港中國筆會的成立，「友聯」的負責人之一燕歸來是關鍵人物，她在巴基斯坦參加亞洲作家會議，遇到當時國際筆會秘書大衛·卡佛爾（David Carver），²⁴ 受他委託在香港成立分會。筆會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成立大會在界限街 156 號 A 友聯出版社舉行，便說明了它和「美援文化」的關係。出席成立大會的重要會員，除燕雲外，還包括黃天石、易君左、左舜生、徐速、力匡、孫述憲、徐東濱、陳濯生等。黃天石被推選為主席，且之後連續出任了十年，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羅香林被推選接任。²⁵ 第一屆七位幹事包括左舜生、羅吟圃、易君左、燕雲、水建雲、徐東濱、陳濯生，其中陳濯生堅持不就任，並推薦黃思騁代替，黃氏當選為司庫，燕雲出任秘書。²⁶ 在筆會成立

24 據國際筆會網頁（<http://www.pen-international.org>），卡佛爾在 1951-74 年擔任此職。國際筆會是 1921 年由英國一些文藝作家——包括詩歌（Poetry）散文（Essay）和小說（Novel）各種作品——為着向出版界爭取合理稿費而組織的一個俱樂部。俱樂部的名稱以三種文體的英文名稱開首第一個字母組成。中國筆會據說在 1923 年於上海成立，胡適、梁實秋和徐志摩等人是發起者。見雷嘯岑：〈國際筆會剪影〉，《文學世界》秋季號（1957）：頁 74。卡佛爾的中文譯名據〈編後附記〉，香港中國筆會編印：《香港中國筆會通訊錄》，未刊出版年月，當時的主席羅香林的序寫於 1967 年 3 月 31 日。

25 羅香林：〈短篇小說選序〉，香港中國筆會香港文選編輯組：《短篇小說選》（香港：香港中國筆會出版，1968 年 6 月），頁 1。

26 岳騫：〈中國筆會簡介〉，《香港時報》，1975 年 4 月 5 日。除特別註明外，本段資料大部分

兩年後，第三次會員大會中，黃思騁再被選為十位幹事之一，²⁷ 並被推選參加九月在東京舉辦的國際筆會第廿九屆大會，他發表了非常詳細的〈東行散記〉，記錄是次行程各方面的見聞。²⁸ 筆會類似的外訪和接待活動，對會員意義甚大，使他們雖然身處一隅，卻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作家見面交流。²⁹

黃天石在一九五四年四月「獨資創辦」³⁰《文學世界》旬刊，每期封面均印有「傑克創辦」四字，出版十二期後停刊，至筆會成立並由黃天石出任主席後，在一九五六年復刊，經銷和承印均由友聯出版社包辦，成為筆會的會刊。³¹ 筆會在羅香林主持後，學術氣息加強，文學刊物的規模有所縮減。《文學世界》在一九六六起改為《文學天地》，³² 每兩周一次在《星島日報》刊出半張，並增辦《筆薈》雙周刊，同樣以半張附刊的方式刊於《香港時報》。黃思騁在《文學世界》復刊後才比較活躍，顯示筆會的人脈在發揮作用。他主要發表短篇小說，偶有文藝介紹的文章，例如在復刊號以黃思村的署名發表〈短篇小說簡論〉，其後又發表〈越劇的興起〉等。³³ 據羅香林所藏的《文學天地》和《筆薈》，³⁴ 並未發現黃思騁的作品。但由於筆會仍然著力出版文學作品選集，黃思騁在此擔當一定的角色。他和李輝英

.....
根據這篇文章。

27 據《香港中國筆會通訊錄》的〈編後附記〉，黃思騁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十二屆會員大會也曾當選理事或候補理事。

28 「香港中國筆會 第三次會員大會 討會修訂會章・推選主席幹事」，《文學世界》第 17 期夏季號（1957 年 8 月）：頁 91。

29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中國筆會在會議上要求以中華民國國旗代表自己，否則一律拒絕出席，並由徐東濱向主持大會事務的日本筆會事務局長松岡洋子提出此意。見雷嘯岑：〈國際筆會剪影〉，《文學世界》，1957 年秋季號，頁 74。黃思騁在〈東行散記〉一文中則記述台灣要求加入國際筆會，但大會認為台灣須在名稱上再作商議。

30 據《香港中國筆會通訊錄》，頁 187。

31 可參許定銘：〈黃天石的《文學世界》〉，《城市文藝》總第 47 期（2009 年 12 月）：頁 32-34。

32 羅香林：〈短篇小說選序〉，《短篇小說選》，頁 1。

33 《文學世界》第 20 期（1958 年 8 月）：頁 48-53。

34 《文學天地》刊出的學術文章較多，但也刊出小說和新詩。羅香林的〈刊頭語〉鼓勵青年多投稿，目的仍在文化傳承。《筆薈》由劉家駒主編，以連載短篇和中篇小說為主，但也包括新詩、短評、美國作家介紹、羅香林的學術通信和文章。

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的第十二屆第一次理事會上被推舉負責「香港文選」，³⁵ 其後和李輝英一同負責編選《短篇小說選》。³⁶ 編者自言先邀請會員推薦自己和別人的作品，再配合編者的徵求和在報刊上的選擇。³⁷ 這部小說選見證了編者包容的眼光和提拔年青作家的願望，除了筆會會員等右傾文人外，我們還可以找到新銳的本土作家和她們早期的重要作品：如張愛倫的〈家族日誌〉、亦舒的〈杏花吹滿頭〉和蓬草的〈再見，傲慢〉。

香港中國筆會成立的同一年，《蕉風》在新加坡創辦，馬來西亞獨立後遷至吉隆坡。³⁸ 對該刊極有影響的姚拓、黃思騁、黃崖均是筆會會員。³⁹ 雖然黃思騁僅擔任《蕉風》主編三年，但金進指出，方天、黃思騁、黃崖三位主編，加上姚拓這位編委會重要成員，四人都有香港背景，「直接溝通了馬華和香港現代文學的關係」，同時也推動了馬來西亞本土文學的發展。⁴⁰ 姚拓形容他和黃思騁為「非常投機的朋友」、「幾乎可以說是無話不說的朋友」⁴¹，他與黃氏一同編輯《蕉風》的回憶，可見當時在他們的推動下，當地文學活動頗為蓬勃的面貌：

1957年，我由香港遷居馬來西亞，同時也兼編《蕉風》月刊，在供稿方面，思騁兄是支持我最有力的一位。大概是在1959年或者是在六零年，思騁兄由港南來，我主編《學生周報》，他主編《蕉風》，同在吉隆坡八達靈的《蕉

35 〈編後附記〉，《香港中國筆會通訊錄》，頁141。該文又記錄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二次理事會議增設「香港文選編選委員會」，除李、黃二人外，加入的有羅香林、徐速、易君左、王韶生、何家驊、徐東濱等。

36 羅香林：「惟幸去年春初，得蒙李輝英和黃思騁二先生慨然應允，願為先擔任編選短篇小說的工作。」〈短篇小說選序〉，《短篇小說選》，頁1。

37 編者：〈後記〉，《短篇小說選》，頁633。

38 詳見林春美：〈獨立前的《蕉風》與馬來亞的國族想像〉，《南方華裔研究雜誌》第5卷（2011-12）：頁201。

39 據《香港中國筆會通訊錄》，〈編例〉說明會員資料蒐集時間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但三人在更早時已加入筆會，黃思騁和姚拓都出席了第一次會員大會。

40 金進：〈1950、60年代香港與馬華現代文學關係之考辨〉，頁48。

41 原見姚拓：〈悼黃思騁兄〉，《蕉風》第372期（1984年5月1日），頁16-17。轉引自金進：〈1950、60年代香港與馬華現代文學關係之考辨〉，頁51。

風》現址工作。《蕉風》由他主編後，銷路大增。同時，我們在金馬侖、波德申、檳城、怡保等地，舉辦文藝座談會、文藝野餐會等等，在推動馬華文學方面，他和我都盡了一些力量。1961年，因為工作准證不易取得，思騁兄轉到麻坡中化中學執教，兩年後，他重返香港，仍舊以鬻文為生。⁴²

《蕉風》使黃思騁的文學舞台得以伸延至馬來西亞。至於在其他幾種他參與的文學雜誌，則多少反映了港台右傾作家群的彼此支援。《文學世界》的作者群主要是南來香港的右傾文人，除黃思騁和黃天石外，其他活躍作家學者還包括秋貞理、思果、齊桓、慕容羽軍等。《大學生活》同樣在一九五五年創刊，⁴³ 五〇年代中後期，在台北設有總經銷，⁴⁴ 它的作者群更體現台港兩地右傾文人的聯盟狀況，以至香港右傾文人和「第三勢力」的呼應，在該刊可以讀到毛子水、殷海光、董作賓、勞思光、程兆熊的文章，但同時也能讀到蘇雪林、梁實秋、痲弦的作品，以至初涉文壇的楊牧翻譯的詩歌和王文興的小說。身處香港的作家除了力匡、徐速、黃思騁、秋貞理等筆會全人外，還包括潘重規、鍾期榮、金耀基等學者。《大學生活》也曾刊出《自由中國》的廣告，黃思騁在一九五四至五八年，即第十一至十五及十八卷的《自由中國》均有發表短篇小說。⁴⁵

3.2. 《當代文藝》的「文藝函授班」

《當代文藝》是六〇年代中期後，黃思騁重要的文學活動平台。該刊以培養

42 同上註。

43 性質相近又同屬友聯的《中國學生周報》，在第141期（1955年4月1日）刊出廣告詳細介紹《大學生活》創刊號內容，包括新亞書院錢穆院長的〈怎樣做一個大學生？〉、易君左的〈中國四大奇景〉、黃思騁的人物介紹〈L·托爾斯泰〉、燕歸來的新詩〈土坡〉、方天的小說〈阿米巴——哥哥〉等。

44 約於一九六三年起，台北總經銷撤去，但又設有星馬婆總代理，見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大學生活》總第163期（第9卷第19期）。在五〇年代中後期，台北總經銷的書局也有變化。

45 據「雷震紀念館」網上資料庫。

年輕一代作家為己任，⁴⁶ 有意把香港作家帶到國際文壇，⁴⁷ 同時堅持和政治劃清界線，⁴⁸ 不時痛斥販賣色情的小說。⁴⁹ 它的追求和論述，充份表現當時一些文人面對政治和商業兩道夾縫，不願深陷其中卻又無法置身事外的兩難處境。論者指出，高原出版社是「亞洲基金會」的業務之一，⁵⁰ 而《當代文藝》的出版者一直是高原出版社。當然，高原的業務可能對《當代文藝》有些支援作用，高原不但佔有一定的出版市場，而且在文藝青年中頗有地位。⁵¹ 不過，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創刊時，香港的「美援文化」已經退潮，⁵² 徐速得到的直接支持可能有限。該刊編者曾表示：「我

46 〈編後〉：「培養新人，是我們創辦這個刊物的目的之一」，《當代文藝》1966年6月號，頁166。

47 社論，〈向國際文壇進軍〉：「香港作家在國際文壇上也並沒有交白卷。例如國際筆會的亞洲短篇小說選，就選了本港作家黃思騁的〈虛驚〉，韓國外國語文大學主編的世界佳作選集，也選了徐速的短篇〈十誡〉。以我們所知，這都是硬碰硬的，不但毫無人事關係，而且事先連參加應選或請人推薦的方式都沒有。」「只要香港作家尤其青年作家肯努力，總有一天，香港大會堂會在熱烈慶祝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獲獎者。」《當代文藝》1966年2月號，頁2。

48 在第二期的〈編後〉，《當代文藝》已「嚴正聲明」：「我們不屬於任何黨派，也不為任何黨派服務。」六七暴動之後的社論，很能表現該刊在當時特殊而緊張的政治環境如何自處：他們反抗專制的文藝政策，卻也不同意作家文人淪為政治打手。如：「文藝工作者如果喪失了求真的態度，便成為一文不值的文匠，政治集團的吹鼓手，或者為娛樂當權者的文藝弄臣。」見〈文藝工作者的基本態度——從香港大騷動談起〉，《當代文藝》1967年6月號。又如：「當文藝決定於一個政策、一條路線、一個方向的時候，便沒有什麼好談的了，——槍桿子可以出政權，區區文藝豈足道哉！但是，當我們還能享受自由的空氣，我們便不放棄這個權利……」見〈文藝的民主精神〉，《當代文藝》1967年8月號。

49 在發刊詞中，《當代文藝》已表明：「我們無意攻擊任何人，除去直接損害文學生命的色情販子。」見1965年12月1日創刊號。其後〈拔除三面黃旗〉（1966年3月號）、〈正視流行小說的問題〉（1967年10月號）等文都表示了他們對色情小說的深惡痛絕。該刊也曾拒絕發表這類作品：「為了保持文藝的清潔，我們拒絕了發行商代為約定黃色女作家的作品，我們尊敬我們的讀者，也尊敬我們的刊物。」見1966年6月號的〈編後〉。

50 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頁219。

51 《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頁27。

52 鄭樹森：「六〇年代初期，『美元文化』的退潮，本地意識的興起，形成了戰後成長的青年，要求有自己的聲音。當時文社紛紛成立，不知是否五〇年代『讀書會』的一種轉化，從政治傾向轉化為自我成長？」《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頁29。縱觀《當代文藝》創刊初期的內容，和鄭樹森的描述十分吻合。該刊創刊號即關注文社的發展，第三期的社論及以後的一些內容，不時出現「香港作家」一詞，顯示該刊有一定程度的本土意識。又，何振亞和奚會璋回憶亞洲基金會和友聯的關係可作參照，見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1》（香港：三聯書店，

們在香港辦雜誌，完全依靠發行的收入」。⁵³ 配合各方面的資料，應該說，這句話的真確性是頗高的。《當代文藝》的創刊號成績很好，⁵⁴《中國學生周報》廣告稱之為「一鳴驚人」並非完全是美援刊物的溢美之辭，⁵⁵ 而徐速的長篇連載小說肯定保證了一定的銷量。同時，星馬市場也為該刊帶來實質收入，這很能解釋為何該刊中的港星馬關係愈來愈密切，編者曾明白地說：「星馬是本刊最大的發行地區，因此，我們特別重視星馬作品。」⁵⁶ 盧瑋鑾又曾指出，《當代文藝》很受年青讀者歡迎，他們很嚮往在該刊發表作品，因此「對培養年青一輩的文藝愛好者確實有貢獻」。⁵⁷

《當代文藝》一直在星馬和泰國設有總經銷，並且發表很多星馬作家的作品，其中不乏初試啼聲的年輕作者。⁵⁸ 例如一九六六年五月號的〈編後〉，編者特別介紹港馬兩地的青年作家，包括李覺、年紅、羈魂和許定銘，其中特別重視馬來西亞作家年紅，並透露三年前曾在黃崖的介紹下認識他。⁵⁹ 黃崖在一九六二年起接着黃思騁編《蕉風》，同時，黃崖和姚拓也不時向《當代文藝》供稿。由此可知，該刊在星馬稿源和流通，頗得益於《蕉風》的關係，這種關係來自他們的友誼，也來自友聯的背景，可以說，「美援文化」從這個角度支持了《當代文藝》的營運。⁶⁰ 至

2014)。

53 〈編後〉，《當代文藝》第2卷第10期（1966年9月）：頁164。

54 〈編後〉：「本刊創刊號超過了預期的成就，尤其是銷路，幾乎使我們難以想像：發刊第二天，本港重要地區就呈現缺貨狀態，我們是在發行商的電話催促裏，既興奮而又焦急地趕印了再版。」，《當代文藝》元月號（1965）：頁166。

55 《中國學生周報》1965年12月10日第669期的廣告熱情地宣傳《當代文藝》「創刊一鳴驚人」、「兩天銷萬冊」、「四天出再版」。

56 〈編後〉，《當代文藝》第2卷第12期（1966年11月）：頁165。

57 《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頁27。

58 例如年紅的小說〈雪後〉（1966年5月號），英培安的新詩〈水仙花〉（1966年6月號）、〈黑色的V〉（1966年9月號）和〈水手〉（1966年12月號），傅南鵬的散文〈星洲小唱〉（1966年9月號）和〈馬來亞憶〉（1967年元月號）、小說〈二藍〉（1966年12月號），蔡阿沙的小說〈冗長的戀歌〉（1966年9月號）等。編者指〈冗長的戀歌〉是吉隆坡的來稿，並說：「從照片看來，蔡阿沙還是個年輕小伙子，如果一直努力下去，前途真未可限量也。」

59 〈編後〉，《當代文藝》第2卷第6期（1966年5月）：頁166。

60 不過，徐速本人的努力也不可忽略，據黃南翔回憶，他本來就打算把《當代文藝》「辦成一份以

於台灣方面，《當代文藝》創刊之初曾在當地發行，但一年後正式暫停。⁶¹ 儘管後來和東南亞的關係更密切，但在停止發行前，該刊也曾生動地反映港台的聯盟關係。一九六六年三月號，該刊發佈消息，將在三月五日設宴歡迎林語堂，⁶² 五月號則發表林語堂的〈時代與我〉。其後也提過該刊在台灣銷售情況：「我們的刊物已銷到台灣，這是值得向讀者報告的喜訊，聽說那邊的反應很好。」⁶³ 該刊也不時報道台灣的文藝消息，發表當地年輕作家的作品。

《當代文藝》對黃思騁的寫作生涯十分重要，幾乎每期都有他的小說，但對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更能代表他的貢獻的，要算是和徐速一起開辦的「文藝函授班」。這個函授班充份表現南來的右傾文人怎樣在香港繼承和發展新文學傳統的精神，也清晰地顯示黃思騁等人如何透過港星馬的文化聯盟關係傳播和推動新文學。函授班的構思是由黃思騁提出的，他在一九六七年底為刊物創辦兩周年紀念時回憶說：「大約在三年多前，我和徐速兄閒談的時候，我說出辦一個文藝函授班的願望，料想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⁶⁴ 黃南翔也指出，他是主要負責人：「徐速由於《當代文藝》月刊編務繁忙，只能從旁協助，編寫講義等實際工作則由黃思騁負責。」⁶⁵ 刊物全人對此事十分重視，正式招生前就在編後預告，還不時報告進度。⁶⁶ 正式宣佈開班

香港為基地，行銷整個東南亞華人社會、甚至包括台灣地區的文藝月刊。」為此，徐速在1963年七八月間特別到訪星馬，聯絡文友，為當地的發行鋪路。見黃南翔：〈《當代文藝》延綿三十五載〉，《香江文藝》第5期（2002年5月）：頁44。

61 見〈啟事〉，《當代文藝》第2卷第13期（1966年12月）：頁180。啟事雖在12號刊出，但同年6月號的版權頁，已沒有台灣總經銷的資料。

62 據四月號的圖輯，出席宴會的除了黃思騁外，還包括唐君毅、徐訏、徐速夫婦、李輝英、趙聰、蔡思果等。

63 〈編後〉，《當代文藝》第2卷第6期（1966年5月）：頁166-167。

64 黃思騁：〈為函授班說句話〉，《當代文藝》第3卷第25期（1967年12月）：頁163。

65 黃南翔：〈黃思騁不羈而又執著〉，《香江文藝》總第24期（2003年12月）：頁49。

66 〈編後〉：「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我們編輯部正在籌辦一個文藝函授班，希望『當文』讀友支持這個計劃，至於函授的詳細內容及辦法在下期發表。這對於愛好文藝的青年朋友們，也許是個好消息。」《當代文藝》元月號（1967）：頁164。其後又在一九六七年四月號的〈編後〉報告說：「『文藝函授班』勝利的完成了報名工作。」，見該期頁165。

時，社論以「發揚自學精神」為題，說明函授教育的精神，鼓勵「剩餘精力沒有出路」的青年發奮自學，又指出函授教育可補專才教育之不足。⁶⁷ 在六七暴動前夕，這種用心尤為可貴——關懷香港的青年和教育問題，為當時的香港社會對症下藥，已超越一般文藝刊物的功能。

函授班在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正式開辦，招生廣告上說明「請本刊主編徐速及名作家黃思騁先生主理教務」，並可見辦學初衷：

現代文學雖已代替了陳腐的文言文，但一般學校（包括港台各大學）的課程，迄今仍無適當的新文學教材，以致一般在學者均感缺乏適當的指導，而社會上一般愛好新文藝人士，更苦無鑽研門徑及深造機會。⁶⁸

以函授班推廣新文學的意圖十分明白，滿足當時文藝愛好者的需求，則是該刊真切的感受，編後記指設立函授班，是因應讀者的需求：「說起這件事還是我們編輯部建議的，因為我們收到詢問寫作問題的信件實在太多了，如果能成立函部……」又提到：「我們希望從這個函授班裏，不但能孕育出幾位像樣的大作家，而且能提高一般寫作水平。這就不負我們這番苦心了。」⁶⁹ 在另一份廣告中，則說明課程旨在「提高現代語文水平，研究寫作技巧，培養青年作家」。⁷⁰ 根據招生廣告，學員每期會收到教材，每月須做限題習作一次，每三個月測驗一次，習作會被「精改寄還」。函授班還會定期為香港學員舉行座談，討論學員的作品。優秀的作品可以在《當代文藝》或其他報刊發表。值得注意的是，函授班的生源甚廣，遍及南洋和英美。在招生廣告上，列明課程分為高級班和初級班，前者八十名，每月學費港幣

67 社論：〈發揚自學精神〉，《當代文藝》第3卷第15期（1967年2月），頁4-5。

68 「新春喜訊 本刊主辦的文藝函授部 籌備就緒·即日接受報名」，《當代文藝》第3卷第15期（1967年2月）。

69 均見〈編後〉，《當代文藝》第3卷第15期（1967年2月）：頁166。

70 「當代文藝社主辦 文藝函授班」，《當代文藝》第3卷第15期（1967年2月）。此為第三期函授班的招生廣告，下方署「主任徐速 副主任黃思騁」。

十二元、⁷¹ 叻幣八元、美金五元；後者四十名，每月學費十元、叻幣七元、美金四元，學費還註明叻幣和美金，並說明「亞洲其他地區以叻幣計算」。函授班的確成功招收海外學員，曾寄送教材到南洋及英美，其後更因平郵延誤太久而用上空郵，黃思騁說：「寄發教材到港九區，時間就比較容易算得準，南洋及英美地區，經常需要半個多月，有時經途程的耽擱，也有一個月才收到的。我們覺得這種傳遞遲慢的情形，會影響到學習情緒，在經過一番考慮以後，決定用航空寄遞。大家都知道空運郵資相當貴，不過為了使同學們獲益，我們也就不計較了。」⁷² 從涉及的地理範圍和人數而論，函授班的規模不可謂不大。

至於函授班的課程內容，在文學上的立場甚為中立：

小說：中國小說史、小說作法研究，中國古典長篇小說欣賞、中國短篇名著介紹。西洋短篇名著選讀。小說題材講話，小說研究。名家小說研究等。

散文：散文作法研究，中國散文佳作研究，西洋散文選讀，中國古代散文選讀，中國古代散文選讀。

詩歌：中國詩歌發展史、古詩欣賞。古詩作法講話。新詩作法研究，新詩選讀及欣賞。⁷³

徐速和黃思騁雖是推動新文學的作家，但課程內容兼顧古典文學，其中小說的作法研究、西方短篇名著選讀等課，明顯地表現黃思騁個人的專長和趣味。這樣的課程需要大量的範文，黃氏坦言在籌辦之初，為張羅教材十分煩惱，他先是找正在外地辦函授班的友人幫忙，被索價九千元，因此作罷，也透露有時因為來不及排版而需要親自抄寫部分教材，⁷⁴ 箇中辛勞，可見一斑，而傳播新文學、提高文學欣賞

71 按六〇年代中熟練工人每天工資僅9元，一般勞動階層約月薪百元的情況，這學費不算十分便宜。見劉蜀永：《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267。

72 黃思騁：〈為函授班說句話〉，頁165。該刊1967年9月的第二期招生廣告宣佈外地改為航空郵遞，學費照舊。

73 「當代文藝社主辦 文藝函授班」，《當代文藝》第3卷第15期（1967年2月）。

74 黃思騁：〈為函授班說句話〉，頁163-165。

能力、培養新一代作家的努力也令人動容。儘管函授班比較活躍的時間只有一年，一九六八年之後不怎麼被提起，但它的影響力仍然很明顯，不但讀者反應熱烈，名額求過於供，⁷⁵ 並三度招生，⁷⁶ 也的確刊出了不少學員佳作，⁷⁷ 對鼓勵當時的文學愛好者作用甚大。

在兩岸文藝政策定於一專的時代，香港為黃思騁提供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實踐他多方面的文學職志，也處處見證港台星馬在文學方面的聯盟關係，共同促進當時新文學的發展。與此同時，在商業化的文學出版工業也有類似的現象。羅斌在一九五〇年創辦環球出版社，為了擴大市場，它的出版物很快發行到東南亞。⁷⁸ 當時香港流行的「三毫子小說」，羅斌的「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是最大出版商。⁷⁹ 寫作這種通俗小說的收入可觀，⁸⁰ 黃思騁可能因為這個原因而曾經寫作「三毫子小說」，未嘗不可視作這位南來右傾文人的另一生存方式。黃氏現存的「三毫子小說」數量不多，都寫於五〇年代末至六〇年代初，本文以其中主要的八部作為分析

75 1967年3月號〈編後〉：「我們的函授班已獲得意外的成功，發行三天後香港區已經滿額，而我們第二發行區的星馬區還沒有看到簡章，所以迫得修改原定的計劃，來容納更多的『學位』，因此，開課的時間要延遲到四月一日了。」1967年8月號〈編後〉：「文藝函授班招收第二期新生，從前寫信來而被拒絕的朋友們，請勿失良機。」

76 1967年8月第二期招生，1968年1月第三期招生。見該期招生廣告。

77 例如1967年6月號發表小說〈你知道嗎？〉、1967年7月號發表的散文〈心霧〉、1967年9月號發表的散文〈曇花〉、1976年11月發表的舊體詩〈村女冤〉，都是函授班的習作。編者特別讚賞〈你知道嗎？〉的作者刀詩：「本刊的老讀者，大概還記得『刀詩』這個筆名以及她十四歲時發表的〈爸爸的情人〉那篇小說吧！過了一年，這位小作家似乎更早熟了。這篇〈你知道嗎？〉是她加入本社文藝函授班的習作，稍加潤飾，與諸名家的作品放在一起，毫無遜色。香港的年青一代，人才輩出，太令人興奮了。」

78 有關羅斌如何取得海外書局和報攤的聯繫，可參看陳國燊：《一筆橫跨五十年》（加拿大卑詩省列治文：9297 Enterprise Inc., 2006），頁14-16。

79 黃仲鳴：〈不要輕蔑「三毫子小說」〉，《文匯報》，2004年11月13日。許定銘亦指：「『三毫子小說』的叢書不少：《小說報》、《好小說》、《ABC小說叢》、《海濱小說叢》……而以流行小說出版業龍頭大哥『環球出版社』的《環球小說叢》獨領風騷。」見許定銘：〈三毫子小說〉，《大公報》，2011年4月9日，C04版。

80 許定銘：「據說每種書的銷量以萬計算，此所以出版社能付每書二至三百元稿費，在政府初級文員亦僅月薪二百七的一九五〇年代，算是相當可觀的報酬。」同上文。

對象，⁸¹ 以女性形象為切入點，剖析這些作品的反通俗元素，試圖指出黃思騁的短篇小說美學和通俗小說的文體、傳播成規互相制約，使「三毫子小說」的面貌也染上嚴肅作家的主體色彩。

4. 嚴肅作家的「三毫子小說」

4.1. 遙遠的讀者

黃思騁廁身「三毫子小說」作家的名單之中，被視為「嚴肅作家」。⁸² 當然，「嚴肅」和「通俗」兩個概念難以定義，作家和出版社也難以據此定位。⁸³ 但事實上，黃思騁的美學理想和通俗小說的文體要求以至讀者趣味之間，一直存在緊張關係。一九五三年為短篇小說集《落月湖》寫序時，黃思騁說：「只要沒有人敢出來證明，不是趣味低級的書就沒有價值，我便有勇氣繼續工作下去。」⁸⁴ 一九五六年出版的第五部短篇小說集《獨身者的喜劇》時，他在自序中說：「照說，短篇小說只需要全篇的氣氛和一個效果，不需要什麼情節。世界上過去的幾個著名的短篇小說家，都不注意情節。然而我們的讀者，都強烈地要求一個動人的情節，否則就覺

81 包括《情潮》（1956）、《紅顏薄命》（1959）、《黑森林》（1959）、《毒蜜》（1962）、《關山行》（1962）、《零落啼痕》（1963）、《隱情》（1963）及《大好年華》（不詳），除了《情潮》之外，都由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屬「環球小說叢」及「環球文庫」系列。在《紅顏薄命》的「環球小說叢」廣告中，可知黃思騁同期還出版《放蕩十年》、《情天劫》、《魔鬼的交易》幾本三毫子小說，惟暫未得見。

82 許定銘：「而令我略感詫異的，是我一向認為是嚴肅文學作家的：上官牧、司空明、黃思騁、路易士、王樹（書法家王植波）等，都是《環球小說叢》的作家。」〈三毫子小說〉，《大公報》，2011年4月9日，C04版。

83 例如羅斌的出版事業也偶有涉及嚴肅和實驗性的文學刊物，如《文藝新潮》等，不可全以「通俗」或「流行」視之；而高原出版社是依靠幾部暢銷小說支持的「中額」（middle-brow）出版社。在這樣的語境中，黃思騁的「三毫子小說」也可見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互相滲透和碰撞的情況。因此，本文無意把這兩個概念作簡化的二分和對立，相反，是為了見出黃氏這類作品及其寫作行為的複雜性。關於高原和環球的簡略比較，可參《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頁25-26。

84 黃思騁：〈自序〉，《落月湖》（九龍：人人出版社，1953），頁1。

得乏味。」⁸⁵這幾句話生動地表現了嚴肅意義上的短篇小說家和典型的通俗小說讀者之間的碰撞。黃思騁並非完全不願意在情節上多作交代、讓文筆更淺易、選材接近讀者的生活，事實上，黃思騁也曾改名黃思村，⁸⁶希望增加讀者的親切感。不過，若和鄭慧、依達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黃思騁和他的讀者距離仍然很遙遠。鄭慧在《女子公寓》的序中說自己曾是「傳奇小說迷」，成了作家之後仍很受這類小說影響，「似乎認為非要有一個出奇制勝的佈局和詭異迭出的高潮，不足以引起讀者的興趣」。⁸⁷鄭慧指出，她的朋友們因此指出她的作品不夠真實感，於是她改正過來，但又因為配合讀者趣味而再犯這毛病：「其實，有時候，我明知樸實無華的可貴，可是為了避免平鋪直敘和要討好讀者，有幾篇仍不免重犯了這個毛病。」依達的《畫戀》給多屬中篇體裁的三毫子小說另創一種新體式，筆者認為是十分聰明的做法。他把一個中篇細分為五個短篇故事，並在卷首對他的讀者開誠佈公，建議讀者可以一天看一個故事，還說自己很少寫短篇小說，請讀者多多指教。⁸⁸讀者趣味是鄭慧念茲在茲的問題，依達對讀者誠懇謙虛又循循善誘，和黃思騁的態度相去甚遠，他們大概難以想像「迎合讀者的口味是一件壞事」。在通俗小說生產和流通的過程中，讀者的接受是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讀者趣味不但能「遙控」作家的寫作策略，透過和作家的直接溝通，讀者更可能參與寫作過程，黃思騁對這一點顯然還沒有充足的準備。

85 黃思騁：〈自序〉，《獨身者的喜劇》（香港：友聯出版社，1956年7月）。

86 黃思村：「親愛的讀者：當你們看到一個陌生的名字出現在你們面前時，請你們不要驚異，因為『黃思村』原就是『黃思騁』。我想改這個名字已經很久了，因為我覺得『騁』字不普遍，而且在讀音上也困難，『村』和『騁』在南方人讀起來完全一樣，北方人則有些不同。希望愛護我的讀者，在看到『黃思村』這個名字時，會有同樣的親切感。」〈編者兼作者啟事〉，《感情的奴隸》（香港：文風書店，未刊出版年月）。

87 鄭慧：〈自序〉（1954年9月），《女子公寓》（香港：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未刊出版年月）。

88 依達：「這兒是五個獨立的故事，包括『落日紅帆』、『離情』、『情書』和『狗與主人』。我把它們齊集起來，用了『畫戀』這個書名，這是由於我特別喜歡『畫戀』這故事的緣故。也許你的見解與我不同，那麼在這五個內容不同的故事中，我想你總能找到一個自己比較喜歡的，要是我的故事還不大壞，你可以一天看一個。因為我很少寫短篇，要是寫得不好，請不要埋怨，但是請你指教我。」《畫戀》（香港：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1962年9月25日）。

4.2. 兩種女性形象

黃思騁的「三毫子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為兩類，大都不得善終：一類本是純潔而有道德的女性，卻總是因不得已的原因陷入情慾的罪行，可以《紅顏薄命》和《零落啼痕》為例；另一類是甚為典型的蛇蠍美人（*femme fatale*），總是給深愛她們的男人帶來悲慘結局，可以《毒蜜》和《關山行》為例。《紅顏薄命》的賴妮良本來過着幸福的家庭生活，但因為丈夫在一次交通意外中雙目失明而命運改變，她被誘與上司通姦，後來又為維生而當上妓女，最後把性病傳染給丈夫，因為沒有懷上她和丈夫的孩子，完全失去生存意義，自殺死了。這個女性和《零落啼痕》的何文琦一樣，一旦失足就無法回頭，只能一直墮落。何文琦本來是西南聯大的校花，在學校是高傲的風雲人物，假期回家時，因為當中學教師的父親胃病復發，她幫忙父親編訂教科書，又因為要籌措旅費，結果耽誤了行程，沒能訂到車票，要坐順風車回西南聯大，她的命運從此改變，先是被順風車司機強姦和逼婚，後來被丈夫騙到馬來西亞，被遺棄在那裏，本可教書過活，卻又因與學生同居而無法立足，最後不知所蹤。

詹明遜（Fredric Jameson）在〈大眾文化的具體化和烏托邦〉一文中，把大眾文化視為「對社會和政治焦慮與幻想的一種改造工作」：「這些焦慮和幻想必然在大眾文化裏有某種實際的存在，惟其如此後來才能對它們『控制』或壓制。」⁸⁹ 鄭樹森曾簡明扼要地介紹詹明遜的理論：「大眾文化作為一種商品，自然具備消費的、匱乏省思批判的、絕大多數均欠缺藝術自覺性等性格；但這種文化商品有時也深藏某些理想成分，暗含某種烏托邦的元素，透過作品的熱鬧情節，在消閒上吸引讀者，但同時也映照出讀者內心裏無意識的渴求，在消閒接滿足羣眾混藏的、期望美好的

89 中譯見王逢振主編：《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詹姆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6月），頁71。原文為 Fredric Jameson, "Reification and Utopia in Mass Culture," *Social Text* No.1 (Winter 1979): 130-148, 又見 Fredric Jameson, *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1-46.

慾求。」⁹⁰ 鄭教授還指出勒德威（Janice Radway）的美國言情小說研究，頗能證實詹明遜的理論。勒德威的研究在另一部重要的藝術社會學著作中被視為研究案例，著者更為明確地指出言情小說在女性讀者和父權社會之間的潤滑作用：「羅曼史暗示女性能將父權制的負面之處，重新解釋為通往真愛之路上的小誤會。圓滿的故事結局，使女性再次確認，自己在父權制中的位置是牢固與有利的」；「在父權脈絡下閱讀這些小說，卻未引領它的讀者捨棄此一體制。更確切地說，它們貢獻給女性的，是在父權需求之下的一種補償與反抗之道。」⁹¹

這裏借用詹明遜的理論和勒德威的研究嘗試指出：成功的通俗小說既能挑起和滿足讀者某些暗藏的慾望，又能化解和壓制這些慾望，肯定個人需求的同時，又維護社會建制。以男女感情為主題的言情小說，女性讀者是不容忽視的群體，完美的戀愛故事甚或處理得宜的出軌情節都能滿足她們的慾望，化解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遺憾和不滿。黃思騁的部分「三毫子小說」以男女感情為主線，輔以偵探、懸疑或冒險元素，可以視為言情小說，但女性讀者在他的這些小說中可能找不到立錐之地。以《紅顏薄命》為例，⁹² 失足的女人成為墮落的女人，被社會厭棄，賴妮良在經濟和感情都沒有依靠時曾經一度行乞，而敘述者對她並不同情，把較多的責任歸於她自己，而非引誘她的上司和性情大變的丈夫。《紅顏薄命》的題辭是這樣的：「她不是一個壞女人，可是沒有人會原諒她背夫的邪行。只因她意志薄弱，在她週圍又是荊棘滿地，她總得要走一條路，不意那條路越來越狹，終於走向生命的盡頭。」⁹³ 在這作品中，父權社會及其價值觀始終是一巨大的存在，沒有被質疑，故此之後也毋須被重新肯定，女性的失足沒有被視為對父權制度的挑戰，始終停留

90 鄭樹森：〈大眾文學·敘事·文類——武俠小說札記三則〉，《二十一世紀》總第4期（1991年4月）：頁114。

91 Victoria D. Alexander 著，張正霖、陳巨擘譯：《藝術社會學：精緻與通俗形式之探索》（台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203-204。

92 《零落啼痕》難以被歸入言情小說，因為沒有完整的愛情線索，男主角的人格卑劣，和女主角之間沒有真正的愛情關係。

93 黃思騁：《紅顏薄命》（香港：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1959年10月），頁2。

在道德批判的層面，所以，也沒有滿足和化解女性讀者慾望的功能。

對照《隱情》，我們能更理解何謂言情小說有效的操作模式。《隱情》堪稱黃思騁最成功的言情小說，他現存的「三毫子小說」中最流暢和渾成的一部。故事講述美麗高貴的少婦林燕妮的丈夫被殺，林從此無心管理農場，任由它荒廢。為思念丈夫，她請畫家竺大棣畫出自己想像中近乎完美的丈夫形象，最後竺大棣不但找出殺害林燕妮丈夫的兇手——丈夫的朋友康鎮邦，而且抱得美人歸。儘管有些情節不一定有需要，⁹⁴ 但這個故事的情節較為緊湊，能製造懸念，各個要素有機地配合，例如農場為凶案提供適合的場地，大宅作為豪華浪漫的空間，是言情小說常有的。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也比較鮮明，林燕妮的兒子「小蠻子」對推動情節十分有效。不過，這裏想指出的是，女性失去了父權制度的庇護（丈夫的死），受父權制度的迫害（作為兇手的情夫、丈夫的朋友），最終也由父權制度撥亂反正（正直勇敢的情人）。曾經通姦的女性沒有被追究道德責任，最終在父權社會下被原諒，一個完美家庭重新建立，女性能在建制內帶着下一代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如果純潔的女人墮落很少被原諒，那麼致命女人就更難被特赦。《毒蜜》的敘述者黃營長愛上管麗娜，因此債台高築，甚至意圖以權謀私，欺壓百姓以取得錢財還債。黃營長曾一度成功自拔，打算另娶一個賢淑的女人玉玲，她卻被管麗娜和別人合謀殺害了，黃營長最後親手殺死管麗娜，被軍法審判，坐牢七年，再無行軍壯志，仕途一蹶不振。《關山行》的李如婉「美貌近乎妖艷，非常惹人眼睛」，⁹⁵ 但原來是極凶殘的盜賊，和另外兩男一女合夥作案，不但盜取財物，還做販賣人體內臟的勾當，對成人小孩都一樣下手。男主角有幸逃過一切，李如婉最後被捕，卻毫不畏死，令拘捕他的警員「差不多呆住了」，因為「他從未見過如此從容的犯人，

94 例如竺大棣為林燕妮畫裸體寫真一節，對故事情節和人物塑造未必有很大作用，但可能有配合市場需要的目的，不妨視之為這個小說中的通俗元素。

95 黃思騁：《關山行》（香港：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1962年10月25日），頁2。

也沒有見過這麼美麗的私梟」。⁹⁶ 在《感情的奴隸》這篇小說中，致命女人梅書紋摧毀一個入世未深的青年陸志堅，造成更慘烈的後果——陸志堅原本打算腳踏實地工作，和守寡養大他的母親相依為命，但因為梅書紋而性情大變，不但散盡家財，還把母親安置在一間簡陋的木屋中。後來他知道年老的母親雙目快要失明，自覺愧疚，才決定離開梅書紋，但已經太遲，木屋失火燒死了母親，陸志堅跳樓自殺。《感情的奴隸》由文風書店出版，比上述的「三毫子小說」少了些曲折的情節，描寫梅書紋的美貌不像管麗娜和李如婉般反覆渲染，不但完全沒有親密情節，人物的心理狀態有更多刻劃。

在黃思騁的通俗小說中，致命女人一再出現，意義一直疊加和累積，成為特殊的象徵物。在《毒蜜》中，管麗娜的形象直如魔鬼一般，挑起人的慾望，人有時執迷不悔，有時努力抗拒，卻又始終難以割捨，小說中男女主角的糾纏把這種狀態表現得生動有力，⁹⁷ 彷彿寓意人魔對抗，可以指涉極為深刻的命題。當然，美艷的女主角、黃營長和管麗娜親密而暴烈的行為、黃營長和程參謀的槍擊決鬥場面，都可以視為情節上的通俗元素。這些通俗性和深層的人性主題，在《毒蜜》中交融得頗為相輔相承。如果這麼沉重和隱藏的主題可以視為反通俗元素的話，則黃思騁的「三毫子小說」實可視為一種與別不同的「通俗小說」。

通俗小說的結局是很重要的接受指標。勒德威的調查使我們得知，言情小說的女性讀者把大團圓結局（happy ending）視為言情小說第一重要的「材料」；⁹⁸ 而悲傷

96 黃思騁：《關山行》，頁 49。

97 如黃營長對管麗娜的癡迷：「她站在我面前，重心落在一條腿上，嘴裏吸着一支烟。因為旗袍是紅白相間的顏色，使人想起一條赤練蛇。我從她的腳尖搜索到她的臉上，發覺每一部份都是惹火的。她的那一頭彎曲得很自然的頭髮，有一種說不出的風韻。這時，我心裏想：我的營長是用頭顱換來的，可是要我從營長和她之間任擇其一的話，我願意選擇她！」又如結尾黃營長槍殺管麗娜之後的情形：「我舉起槍來，瞄準着她的背，我不能使她美麗的臉破損。」「黃營長，你知道我愛你……」她大聲嚷叫。砰砰兩聲，她斜着身子又落下馬背，橫躺在地上，那匹受驚的馬嘶叫着逃走了。「我跳下馬，俯身去看她。她舉起一隻手來，在我的臉上撫着，說道：「你幹得好，讓我死的時候也知道你在我身邊！」「麗娜！麗娜！」我熱烈地叫她。黃思騁：《毒蜜》（香港：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1962年7月30日），頁 15 及 50。

98 Janice A. Radway,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67.

結局 (sad ending) 和強姦情節則被女性讀者視為最抗拒的元素，永不應該出現在言情小說中。⁹⁹ 但黃思騁的「三毫子小說」無論是墮落的女人還是致命女人，她們的結局或她們造成的結局大都是悲慘的，《零落啼痕》也有強姦的情節。作為大量生產的文化產品，通俗小說的情節結構往往有一定的雷同，但黃思騁的「三毫子小說」在女性形象和悲劇結局兩方面頗為脫離言情小說的一般模式，無論在人物和情節方面都沒有響應那種雷同。在墮落和危險女人中、在悲劇的結局中，我們都難以找到詹明遜所說的大眾文化的「烏托邦或超驗的功能」 (Utopian or transcendent functions)。¹⁰⁰

事實上，像上文談及的《毒蜜》那樣，黃思騁的「三毫子小說」隱含嚴肅和深層的主題，由兩毫書店出版的《情潮》也有類似的情況。出版社的名字和黃思村的筆名，讓我知道這篇小說是以通俗小說為定位的，雖然價格是兩毫，也不妨歸入「三毫子小說」的類別。但是，《情潮》大部分的情節和場景都處於靈慾角力中，流露強烈的緊張感，而這種緊張感最後沒有透過圓滿結局來化解，例如妻子深明大義回到丈夫身邊，或情人知難而退，或者把苦澀的三角關係提升為更高層次的情誼。和《隱情》不同，《情潮》的農場沒有復興，敘述者「守農」想要把農場賣掉時，買主竟是昔日曾經談婚論嫁的女朋友荷仙，她和丈夫程志聖住在附近，他們的莊園被打理得井井有條。由於三人時常來往，守農和荷仙舊情復熾，經過一陣拉扯之後決定私奔，在私奔前夕，作者突然安排守農的管家薛德明出現，阻撓了兩人的計劃，薛因為妻子被勾引而離開了他所愛護的家庭。作者沒有點明，但守農顯然在他身上看到了將來的程志聖，小說以守農徹夜聆聽薛德明的故事作結，守農的「感情的風暴」隨之消散了。這種反高潮反浪漫的情節急轉直下，頗出人意外，作者給通俗小說常見的三角戀愛和出軌情節，賦予甚為嚴肅的人性反思：道德和愛慾應如何平衡？個人真誠的愛情和對他人廣大的同情之間應如何取捨？

99 Ibid., 74.

100 《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頁 77。

從上述的分析可知，黃思騁的「三毫子小說」基本上維持「中額」(middle-brow)路線，雖以愛情為主題，情節富戲劇性，有時不無懸疑色彩，但可說幾乎沒有亂倫關係和色情描寫，¹⁰¹ 故事並非以甜膩和纏綿的風格為主，女主角的形象難以被認同和代入。¹⁰² 根據現存的資料，黃思騁本人幾乎沒有為自己的「三毫子小說」留下任何論述；儘管無法作全面的統計，但他的這些作品數量遠遠少於依達、鄭慧等作家，箇中原因幾乎是不言自明的。當然，五、六〇年代的通俗小說市場能夠容納多種風格的作品，但在商業化操作的小說生產中，黃思騁亦不無細微的妥協和抗衡，因而始終沒有改頭換面，在通俗的類型和戲劇性情節中，最具震撼力仍是人性的衝突和思考。

5. 總結

五、六〇年代的香港確是左右角力的場域，更複雜又更有價值的是，這個場域為許多拒絕兩岸政權的文人提供一個發揮所長的空間。本文把黃思騁置於這個年代的政治和商業兩道脈絡中，為這位作家的生平和活動資料補白之餘，管窺當時港台星馬在文學傳播方面的聯盟關係，並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再現黃思騁作為右傾文人的生存狀態，考察他為香港內外文學界所作的貢獻。

黃思騁在香港努力了半生，在多種文學雜誌上發表短篇小說，譯介西方以至蘇俄的文學，繼續五四文學傳統，培養年青作家，他的貢獻不容否定。陸離得知黃思騁病重後，曾特別撰文說：「五〇年代，筆者亦是《人人文學》的投稿者，因此黃

101 楊天成的《生死戀》(環球小說叢 40, 未刊出版資料)和張續良改寫的《蘇茜黃的世界》(環球小說叢, 1960年8月9日出版)可以作為對照,前者以小叔和伯母的戀愛故事為主線,男女主角親密行為的描寫甚多;後者對蘇絲黃被強姦等情節描寫得甚為仔細。

102 依達的《冬戀》(環球文庫 191, 1964年3月20日出版)和張續良的《蘇茜黃的世界》都以妓女為主角,但逼良為娼的經過和她們善良而忠於愛情的性格都令人同情。

思騁先生、力匡先生、孫述憲先生、許冠三先生，均曾是筆者的啟蒙老師。」¹⁰³ 因為「美援文化」的介入，黃思騁的活動空間得以從香港擴大至東南亞等地，他的作品和思想得以在港台星馬這個「文化聯盟」中傳播，他服務的文學青年也不局限於香港。他終生致力短篇小說的創作，主編多份重要的文學雜誌，在香港中國筆會擔任要職，編選香港文學小說選集，籌辦和教授「文藝函授班」，譯介西方文學，期望繼承和發展五四文學的成就，推動新文學在大陸周邊地區開展。在那個無法自外於政治的年代，黃思騁等右傾文人雖然或多或少以美援的網絡為生存資本，卻能以推廣新文學和傳統文化價值為終極關懷，因此對港台星馬的貢獻超越時空及政治，其成績值得我們一再記念。另一方面，黃思騁的「三毫子小說」以激烈又戲劇化的情節和典型化的女性形象，降服於通俗小說的生產和接受成規，但同時又留下不少反通俗元素，形成一種既有意符合讀者趣味，又不失作家主體意識的「三毫子小說」。由此，我們可以見到當時的嚴肅作家涉足通俗小說創作時，儘管充滿內在張力，這種張力卻在文本中轉化為挑戰文體成規的積極意義。

黃思騁的遺作《我的足跡》一九八五年在台灣出版。在生命的最後歲月，他為這本散文集撰寫自序時這麼說：「早在五六年前，我就打算出這個集子，而且選定要找台灣的出版社出版，因為台灣語文水平高，有大量的高明讀者，民間還存在一種無形的文學批評風氣。至於香港，由於中國語文教育失敗，不但語文遠遠落在星馬地區的後面，一般市民甚至連讀者的興趣都無法培養……」¹⁰⁴ 這幾句不一定公平的判語，流露了黃思騁追尋一個文學原鄉而不可得的憂鬱，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在他人生的下半場，只有香港這個獨特的空間，才能成為他的基地，向星馬和台灣拓展自己的文學生命，充份地放射他作為文學家、短篇小說家的能量。✧

103 陸離：〈春天再來的時候——祝福黃思騁先生〉，《香港時報》，1984年3月23日。

104 黃思騁：《我的足跡》（台北：林白出版社，1985），頁1。